

昔

中醫形上識

李致重 著



奔馬出版社出版

中 醫 形 上 識

李致重 著

香港奔馬出版社出版



中醫形上識

ISBN : 962 · 278 · 245 · 0

版權所有 · 請勿翻印

著 者 / 李致重

出 版 / 奔馬出版社

香港沙田坳背灣街 14 ~ 24 號

金豪工業大廈二座 8 樓 II 室

電話 : 2694 1576

發 行 /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

凱旋工商中心八樓 C 座

電話 : 2303 1010

印 刷 / 三和印刷廠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5 年 10 月香港(繁體字)第一版

定 價 / 港幣 78 元正

目 錄

前 言(代自序)	6
第一篇 SARS 引發的形上思考	
1、中醫對 SARS 心存感謝.....	16
2、非典型肺炎流行的中醫思考	22
3、採取主動，預防肺炎	31
4、中醫治療非典型肺炎的思路	33
5、SARS 初期中醫治療獨具優勢.....	45
6、關於 SARS 的反思及啟示.....	49
7、SARS 防治的中醫理性之思	55
8、與 SARS 相關的綜合論述(1-6)	73
第二篇 教學臨床形上探源	
9、運用中醫理論防治腫瘤的思路、 實踐與體會	92
10、當代產婦缺乳者增多的中醫防治	106

- 11、談傷寒和溫病的關係 113
- 12、溫病新感與伏邪探源 124
- 13、談溫病的病因(附文) 132
- 14、港台中醫教育芻議 142

第三篇 中西醫配合形上沉思

- 15、《中醫復興論》緒餘 150
- 16、中西醫配合清議 165
- 17、中西醫配合清議之續 178
- 18、以科學的態度推進中西醫配合 203
- 19、從近代科學主義到偽科學 210
- 20、告別結合才能走向中西醫配合 231
- 21、這樣的“學費”不能再繳了 245

第四篇 中醫的形上特點

- 22、中醫形上之思 262

- 後 記 324

亞里斯多德與托瑪斯形上學裏的“原形與原質的學說”認為：“所有的人都從原質與原形合成。所以就人而言，整體水平上的人是原形，組成人體的各種各樣的細胞或分子是原質。原質是‘潛能’，原形是‘現實’。原質具有合成原形的潛能，但原形卻限制着原質。如果原質脫離原形，它將無法獨立存在。按照這些原理，西醫着重研究原質的人，中醫着重研究原形的人。西醫不研究原質的人則不是西醫，中醫不研究原形的人也不是中醫。只要原形與原質的原理不可推翻，中西醫並存的格局將不能改變。明智地講，西醫必須告別近代科學主義，因為西醫不能包攬整個醫學科學，就像原質不能取代原形一樣。”

——引自《中西醫配合清議》一文

前 言

——代自序

思想和語言是人類理性之所在，很難想像人類如果沒有了思想和語言，社會將會變成什麼樣子。亞里斯多德在其《形而上學》開頭的第一句話便說：“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”。於是人們對自己所生活的世界、生活的本身和人類自身，在廣泛觀察的基礎上經過反覆的思考，便獲取了種種新的知識。這種種新的知識，就是人類的思想產品。

在西方，科學最早的含義即學問或知識，早期在拉丁語中的用詞是 *Scientia*。最接近拉丁語詞原意的德語對應詞是 *Wissenschaft*，英語中的常用詞為 *science*。而哲學 (*philosophy*) 這種知識就其概括的層次而言，在一般科學之上。所以當年把英文中 *philosophy* 一詞翻譯為哲學時，其最早的含義即“愛知識”。因此習慣上談到科學與哲學的關係時常說：“哲學是科學的科學。”用今天的話講，科學與哲學都屬於知識的範疇，只不過兩者不同層次上的科學而已。人們對於周圍的一切(包括自己)若有所思，或是對天道、人道的理性反思，只要人們在不斷地思維着，知識便與日俱增，語言亦日趨豐富。人的理性思維以求知、明理為目的。人若不善於思維，或者變得不會思維，對於人來說，無異於天性的泯滅。人若把科學、哲學看得高不可攀，或者製造科學迷信，以一種科學詆毀另一種科學，對於整個人類來說，自然是最最可怕的了。

(一)

人類在“科學”的分類上，最早、最準確、至今仍不失其指導意義的，當推中國春秋時期的《易經》。《易經·系辭第十二》上說：“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”“形”，在當時指的是自然生成的客觀實在，今天可以理解為天造之物；“器”，古人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觀實在，今天可以理解為人造之物。所以，用天造之物和人造之物這兩類不同的研究對象來說，科學便可劃分為“形上”和“形下”兩大類。

然而在《易經》的時代，由於人類製造器的能力尚十分有限，這是用不着奇怪和遺憾的。這倒在客觀上將人類的求知天性，逼向了研究天造之物這一條道路上。無論如何，人是天地萬物之靈，而且求知的天性是偉大的，不會停頓的。這一點現代人需要保持清醒，切莫無端地自以為是，而卑視前人。

春秋—秦漢之際是人類文明的第一個高峰，不論哲學還是一般科學，都有許多不滅的成就。尤其在形上性科學(包括哲學)方面，其真理性、先在性、實用性，雖然用今天的科學觀念難以理解，但是又不可或缺、難以企及。只要稍稍想一想，為什麼中國的諸子百家，印度的佛陀釋迦牟尼，古希臘的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等都出現在那一時期，我們就無法對那一時期有所輕視。

在西方，亞里斯多德“幾乎掌握了希臘人所有的知識。他的著作包括了生物學、經濟學、政治學、物理學、哲學、心理學等等。今天任何一門歷史深遠的學科，一打開哲學史，都會發現這門科學或學科的創始人是亞里斯多德。”那時候，“希臘的哲學精神和科學成就，可以說達到了高峰。”(文滄主編《在北大聽講座》，北京，新世界出版社，2004年3月第2版，第51頁)應當說，那

一時期東西方先哲們的思想結晶，至今仍然是自然、社會、生命、思維領域的哲學基礎，並指導着當代的科學進步。

(二)

“人是天生的形上性動物”，所以凡是與人相關的科學、哲學，形上之思，必不可少。就春秋—秦漢之際的研究方法來說，更是這樣。

那時候，人們面對着天造之物，反映在感官裏的只是天造之物運動、變化着的形或象（註：形與象二字在古文字中相通）。對於運動、變化着的形或象，人們當然不能將其作為人造之物來對待。而欲知支配形、象運動、變化的原因，就必須思考這樣三個問題。其一，這些天造之物是如何來的；其二，它是如何發展、運動、變化的；其三，它是如何消亡以及消亡後向何處去的。對這三個問題的思考，便使前人走上了“向上攀爬”的認識方向。這就是中國的經典中稱之為“下學而上達”或“形而上”的認識方向。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形上性的認識論和方法論。

這種形上性認識論和方法論，就其實踐過程而言大體可以概括為三個過程：首先，人們從綜合地觀察天、地、人入手。通過“仰觀於天”、“俯察於地”、“近取諸身、遠取諸物”，以全面、真實地把握萬事萬物之間的複雜的聯繫與關係。接着，通過“究天人之際、類萬物之情”的理性思維，將萬事萬物之間的共同屬性、特點加以抽象概括。然後，在諸多屬性、特點的抽象概括中，通過理性的演繹，最終認識了天地萬事萬物（包括人類自己）發生、發展、運動、變化、消亡的總原理或總規律。這裏講的總原理或總規律，就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“道”。

在“道”的面前，中國的先哲們在敬畏中表現出了驚人的明智。這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的“道”，在“至大無外、至小

無內”的萬事萬物中，是無所不在、無所不有的。以人性本來的卑微來看，人不可能認識全部的先在的“道”。就是說，人固然在綜合、抽象、演繹中肯定了“道”的存在，甚至可以做到“道可道”。然而由人們講出來的，却並非全部、先在的“道”。由人的理性所認識到的或者講出來的，其實只是“德”。即便《道德經》中由老子所寫出來的五千言，其實仍然是德。或者也可以說，老子五千言只是人的理性所認識到的小小一部分“道”而已。

道在所生成的萬事萬物中的具體體現，按照《易經》的習慣，稱之為“氣”。在天地間的萬事萬物中，因為每一個別事物與其他事物的“取道”各不相同，於是便形成了天地間五彩繽紛、各具特色的萬事萬物。而具體體現在每一個別事物中的“氣”，則是該事物發生、發展、運動、變化以至消亡的生生之“道”。不過這種稱之為“氣”的“道”，只是“小道”，它不可與先天地而有的本體論的“大道”相比。自然，大道派生小道，小道從屬於大道。天地間萬事萬物如此，生命過程中的人當然也是如此。

人們通過“向上攀爬”的方向來認識“大道”，又回過頭來以“大道”的原理、規律來認識每一個別事物所獨有的“小道”，這就是形上性的認識論、方法論的思維方式。這種思維方式，也是中醫的形成與發展的基本思維方式。

(三)

以形上性的思維方式認識人的生命過程，便形成了中醫學。而中醫學體系成熟的標誌，就是現存的《黃帝內經》。

從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的“七經”來看，當時與《黃帝內經》並存的，還有《黃帝外經》、《扁鵲內經》、《扁鵲外

經》、《白氏內經》、《白氏外經》和《旁篇》。這種情況與《聖經》傳播的歷史，頗有相似之處。據載，當年記錄福音的羊皮書，還有許多部。後來經宗徒們確定並錄入《聖經》的，只是現在稱的“四部福音”。儘管現存的《黃帝內經》只是“七經”之一，那是用不着遺憾的。兩千多年的歷史表明，對中醫學來說，有《黃帝內經》一書，已經足夠了。因為形而上的思維方式和中醫的概念、範疇體系，《黃帝內經》都已經充分體現出來了。

據《黃帝內經》的有關記載，該書對自身在中醫科學體系上的奠基地位，也是充分肯定的。《素問·陰陽應象大論》在評議自身的價值時說：“論理人形，列別藏府，端絡經脈，會通六合，各從其經；氣穴所發，各有名處；髌谷屬骨，皆有所起；分部逆從，各有條理；四時陰陽，盡有經紀；外內之應，皆有表裏”。倘若《黃帝內經》不是在揭示了人的生命過程和防病治病的規律，並形成了確切的、系統化的概念(範疇)體系，相信作者不會用如此明確的言詞來自我肯定的。同樣，確定了中醫辨證論治臨床體系的張仲景也是這樣，他在其《傷寒雜病論》的“原序”中說：“撰用素問、九卷、八十一難、陰陽大論、胎臚藥錄、並平脈辨證，為傷寒雜病論。雖未能盡愈諸病，庶可以見病知源，若能尋餘所集，思過半矣”。這裏的“思過半矣”，顯然是自謙之辭；而“可以見病知源”，正是張仲景鏗鏘有力的自我肯定。近兩千年辨證論治的臨床實踐，也雄辯的證明了仲景先師，言之鑿鑿。

古今中外，凡在形上性學說或形上性科學上做出貢獻的人，多被後世尊為聖賢。一方面這是對其貢獻的充分肯定，另一方面說明，做好形上性學問，難度實在太大了。張仲景在序言中引孔子的話說：“生而知之者上，學則亞之，多聞博識，知之次

也”。其實孔子並不贊成“生而知之”之說法，他主張的是“人非生而知之，孰能不惑”的治學態度。所以，當“經典”的地位為歷史所認定之後，絕大多數的後來者恐怕只好做“學則亞之”，或者“多聞博識，知之次之”的學子了。由此推而廣之：對於《易經》、《老子》以及其他諸子百家，對於佛經，對於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，不論當初還是現在，也不論中國還是外國，凡是對“經典”能做箋、註、補、正的人，都是在形上性學問上學有所成的學者。

清代名醫陳修園對《黃帝內經》和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所做的箋註補正，令人讀起來常不免隨文衍義，析理欠深之概。然而近二百年裏，能寫出陳修園箋註補正的醫家，又有幾人呢！在“下學而上達”的形上性學問上，具備“究天人之際”、“類萬物之情”的抽象、演繹能力的人，實在並不易得。難怪中醫界常常有一種慨嘆，以為中醫之理，深奧入微，“可意會而不可言傳”。“言傳”與“意會”，實為中醫（包括所有形上性學問）傳承中的兩個層次。對於多數人來講，“意會”容易而“言傳”難。只要能做到“意會”其理，進而能嫻熟於臨床，對於執業大夫而言，其實即已足矣。深感不安的是，這樣的大夫在當今的中醫隊伍裏，為數並不多。所以這一慨嘆不能理解為中醫理論上的缺陷，它所反映的正是形上性的中醫在傳承上的一大特點。這一特點，也是所有形上性學問在其傳承和實踐運用中的普遍現象。

(四)

當代中醫學術衰落，原因可能很多。但是，中國文化在當代轉型中對形上性中醫特點的忽視，無疑是重要的內在原因。

其一是機械唯物主義和近代科學主義的影響。“動物是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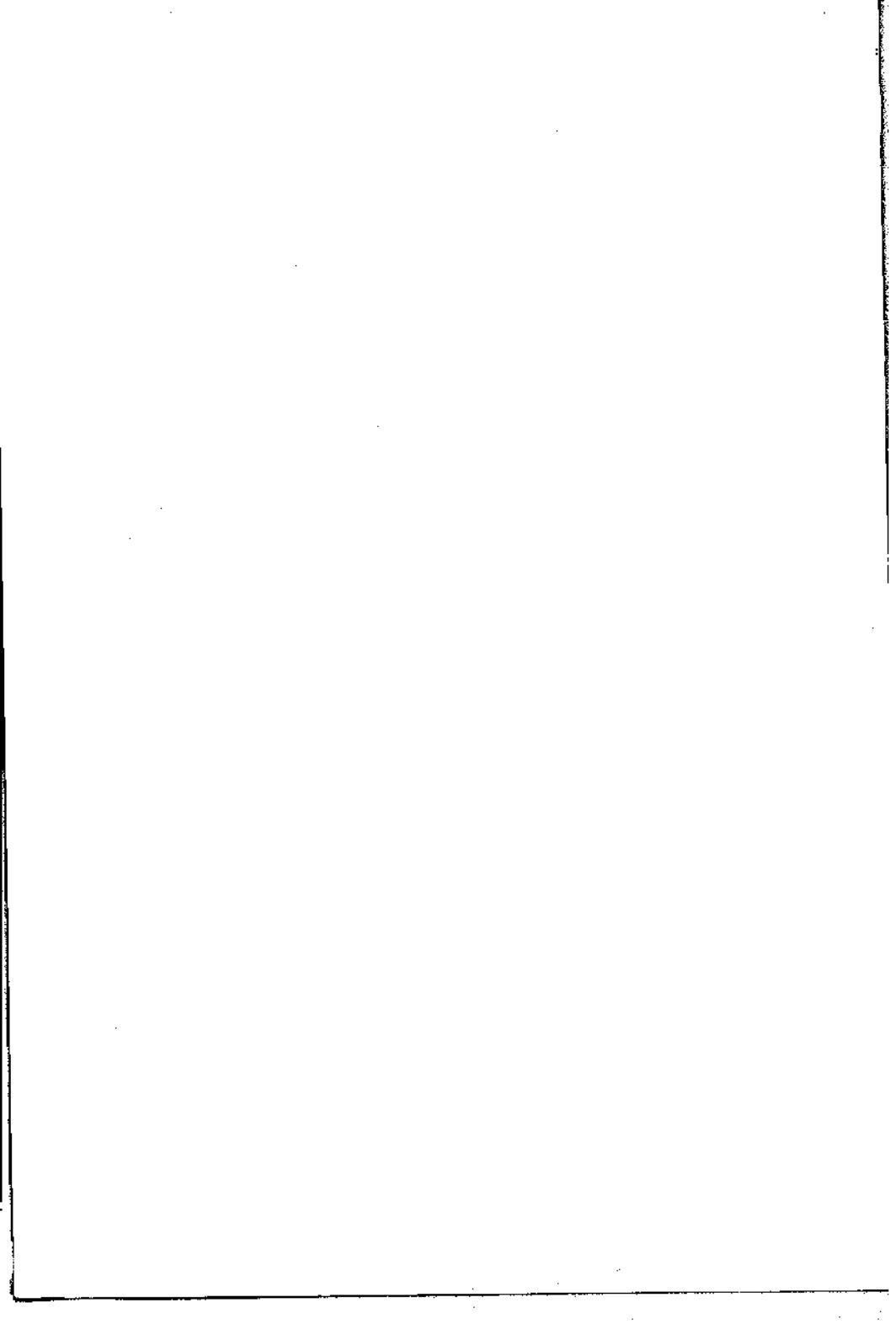
器”、“人是機器”的看法，是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觀點。把近代物理學、化學的觀念和方法作為一切科學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，即近代科學主義。這時候的“唯物論”，事實上淪落為“機械唯物論”、“化學唯物論”，連哲學也因此而陷入迷惘。一百多年來的這些“舶來品”，與“西化中醫”的種種做法直接相關。其二是民族虛無主義和簡單化的哲學代替論的影響。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對號入座地解釋陰陽五行，始自 20 世紀 30 年代楊則民的《內經之哲學的檢討》。“哲學是科學的科學”，這一點毫無疑義；而哲學的普遍原理不能代替各門具體科學的具體規律，也同樣人所共知。在中國，中醫上的代替論來得最早，危害也最大。當陰陽五行被定性為“樸素的唯物論”和“自發的辯證法”時，它的方法論、認識論內涵不僅被局限、被簡單化了，而且連它的哲學價值也被貶低了、被閹割了。其三是由主觀願望和長官意志演變而來的行政口號，取代了中醫的科學管理。軟科學與科學學是管理科學的基礎；軟科學與科學學研究具有鮮明的形上性特點。而“中西醫結合”、“中醫現代化”、“中藥現代化”、“創新”、“發揚”等口號中，滲透着濃厚的不符合中醫科學特點的主觀願望和長官意志。中醫管理失去了科學的支撐，中醫的發展就必然要遭遇種種不幸。

與近代德國哲學家叔本華“人是天生的形上動物”的說法相同，《形上之思》的作者朱德生先生也進一步說：“人與自然動物相比，他在本性上便是形上的。”所以，沒有形上思維就沒有中醫學，離開了形上思維就談不上中醫的發展。可見上述三個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危害，對中醫既是內源性的，更是根本性的。幾十年裏，許多人驚嘆當代中醫變得不會理性思維了，不能認識自我、解釋自我、保護自我、弘揚自我了，其根源都在形上之思的萎縮上。

(五)

回想年輕時，頭腦裏的“形而上學”只不過近代哲學裏的一個名詞而已。這個詞是反辯證法的同義詞，指的是用孤立、靜止、片面、表面的觀點去看世界的意思。與現在討論的形上性學問，含義完全不同。正是因為形上之說出自《易經》的“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”，後來中國人在翻譯亞里斯多德的《第一哲學》一書時，即取意於《易經》而將其譯為《形而上學》。1998年，讀過友人劉鐵林先生介紹的《托瑪斯思想簡介》一書後，才開始對亞氏的“形而上學”有了新的瞭解。2000年來香港浸會大學執教以來，通過台灣學者羅光、方東美、李震、唐君毅、鄔昆如、胡安德、曾仰如、苗力田、劉仲容等人關於形上學方面的著作，才進一步融入於儒、釋、道，逐步地認識了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、托瑪斯·阿奎那。這才開始懂得，形上學原來是一切學問的基礎；形上學原來與陰陽五行學說相互呼應，是中醫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。

2004年1月出版的《中醫復興論》，主要收錄了本人在20世紀90年代關於中醫科學學、軟科學方面的研究與思考。從本書討論的主題而言，應該說是《中醫復興論》的續篇。從本書的主要內容而言，多為2000年在香港浸會大學執教以來的相關研究，其中也有一部分是“中西醫學比較”一課的講稿整理而來的。如果談到與《中醫復興論》的不同，只能說對於形上之思，本書似乎更自覺、更自然了一些。所以本書行將付梓，將其命名為《中醫形上識》。至於出版本書的目的，其實只有一句話——中醫復興與發展的希望，在於形上之思。而對於本人來說，本書充其量只不過記錄了中醫形上之思的開端而已。



第一篇

SARS 引發的形上思考

“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，中國出現了維新改良、勵精圖治的苗頭，也產生了自怨、自卑的情緒。半個多世紀後的‘五四’運動，在請進西方的‘德先生’、‘賽先生’的同時，又出現了‘全面反傳統’、‘砸爛孔家店’的浪潮。今天的世界上，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以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拾級而上，而中國的近代卻沒有為自己營造出各種文化多元並存、共同繁榮的和諧環境。在傳統與現代、本土與外來文化科學上，非此即彼的幼稚病和自毀傳統的劣根性，至今仍然沒有澈底清除。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文化心理的支撐，無疑是悲哀的民族。把近代貧窮、落後挨打的原因一味歸咎於歷史和祖宗，這其實是一百年來中華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撐的表現。”

——摘自《中醫復興論》

中醫對 SARS 心存感謝

發生在 2003 春季的 SARS(即“嚴重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”之英文縮寫，國內習稱“非典型肺炎”，本書下同)，兩年過去了。它對健康造成的威脅，對社會帶來的危害，曾令全世界為之恐懼。然而，它同時也對人類醫學展現出多方面的啓示。2003 年 11 月 18 日在北京召開的“219 次香山科學會議”上，本人第一而見到鄧鐵濤老教授時，相互不約而同的第一句話就是：“SARS 讓中醫走出了谷底，出現了向上發展的好勢頭。”

2002 年的冬季，整個北半球普遍寒冷。北京地區更是 46 年不過的嚴冬，降雪量大，持續低溫。而 2003 年又是“干支甲子紀年”的癸未之年，“主運”係“火運不及”。“大寒”節後，“風木”當令，時值陽氣生發之季。然而春寒太盛，陽氣生發不得，故令天氣忽冷忽熱，溫度大起大落，反覆無常。據本人記錄，從“大寒”到“穀雨”前後，香港忽冷忽熱，大起大落的異常現象，反反覆覆達 5 次之多。在這種忽冷忽熱的春寒環境中，發生外感病的機會必多。2003 年春節前後，耳聞廣東地區出現了一種流行性很强的奇怪肺炎。隨之反覆告誡家人和周圍朋友“冬傷於寒，春必病溫”，“冬不藏精，春必溫病”的道理，以及適寒溫之變，謹防春季外感的方法。

2003 年春節後不久，本校在廣州實習的學生們就頻頻傳來稱之為“非典型肺炎”情況。與此同時，本人在香港的門診中，也遇到多例“太陽病”外感病人。觀察其病情，與廣東“非典型肺炎”早期的臨床表現頗多相似。譬如頭痛、發熱、惡寒、一身